

# 鹤发情怀

---

## 目 录

- 做一名新时代合格党员 ..... 杨 宇 1
- 熏 陶（一） ..... 韩祥林 9
- 邵伯周：撑诗天地与人看（节选二） ..... 徐忠友 18
- 节日漫谈（四）——端午节 ..... 吴世常 26
- 武汉人的性格 ..... 赵兴华 30

上海师大老干部处编

2019 年 第 1 期 总第 43 期

# 做一名新时代合格党员

杨 宇

我先回顾一下个人的成长过程。结合个人的实践和学习体会谈谈怎样做一名新时代合格党员。

## 一、我的青少年经历

### 1. 日军烧屋、少年丧父

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冬，日军烧毁家中仅有的4间房屋。翌年秋天，父亲因日军实施细菌战罹患“黑热病”不治亡故，时年我8岁。

### 2. 腿上的伤疤

1946年，我读完小学五年级，因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打内战进攻解放区使我失学。1947年冬，我12岁，当时在江苏省东台县（今如东县）栟茶镇的一个地方性战役中，我还当过向导。战争一直从黎明打到傍晚。这个时候有一小股敌人依然非常的顽抗，不投降，端着轻机枪和冲锋枪突围，朝我们冲过来。当时我和我的母亲也在前线，给解放军送鸡蛋啊馒头啊之类的食物当慰劳品。在这个过程中我受了一点轻微伤，到现在腿上还有疤痕。

### 3. 母亲的支持

我腿上的伤养了一年，到1948年12月份，伤好了，我就参加革命了。那时候是乡指导员（支部书记）和乡长到我家里来动员我参加革命的。他们说：“你要是想出来参加革命的话，明天就出发。”当时我母亲一口答应下来。她说：“把儿子交给共产党，我没有那么好考虑的。我们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我母亲决心很大，这一点也深

深影响了我。那时候我 13 岁，于是我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 4. 第一份工作

我 13 岁加入了华东支前司令部（支前就是支援前方的意思）粮秣供应总站下的东台军粮仓库这个单位。地址在当时的东台县城三味寺。到了这个军粮仓库，组织分配我当司称员。拿一杆木质的大秤，称粮食，100 斤一挑，每称一挑就放一根竹签。结算的时候就数竹签，比如有 100 根竹签就是有一万斤。

司称员这个工作做了一个星期左右，突然接到一个命令，粮食原地待命，不进也不许出。到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下了渡江作战的命令。长江流域中下游，过了谷雨了，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稳定，气温也在升高。作为进攻方，对我们作战有利。我就是在这之前已经提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参加革命了。

后来因为年纪小，领导和我说“你就不要去跟着渡江了，留在我们县政府这里吧！”就叫我跑到县政府去报到。我就从粮秣供应总站东台军粮仓库调到东台县政府，财经局领导叫我学会计，我学了三个月的会计，被分配到下面一个区政府当经费会计。

#### 5. 第一批入团

1949 年 5 月 4 日，这一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当时我还在学会计的过程中，在这个时候我就入团了。团是 5 月 4 日成立的，我 5 月 5 日入团，入团当天我就在这个会计训练班被选举当上团支部书记。我是 13 岁参加革命，14 岁入团，后来当会计。

## 二、我是党员，要努力做一名新时代合格党员

## 1. 提升思想政治觉悟

1950年5月10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不称预备党员，而称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入党以后，我找到延安时期的整风文献等资料来学习。学习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通过学习这些文章使我认识到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必须要增强党的意识，要加强党性修养，要做到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学习《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思想觉悟大提升。我认为，共产党的事业是关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我当时参加革命主要是解决中国人民的解放问题。入党以后通过学习呢，逐步地意识到中国人民的解放还要和人类的解放相联系，不仅是解放全中国，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我是从“解放全中国”初步意识到中国人民解放不等于地球上的人都解放了，要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话，那就必须要全人类都解放。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是和人类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观念觉悟是我在参加革命、入党后通过学习、工作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2. 深刻认识新时代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同心协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扩大国际视野，真正做到立足本位、放眼全球。你们现在作为学生，就要把自己的课业做好，以后不管你

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把它做好，要谨记立足本位、放眼全球、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我个人认为新时代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梦”和“共同体”的结合。习近平指出，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中国梦和人类的梦想是息息相通的。国际大势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所以我们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实际上就是要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见 2018 年 4 月 9 日《人民日报》）

### **3. 学原著、重实践**

谈学习体会，我觉得有两条：一条就是要读原著。要学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你总要读啊，最好把《资本论》第一卷读一读。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你首先要读毛泽东的著作啊。同理，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必须要把领导人的系列重要讲话，他们的许多文章找出来读。特别要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二条就是学习必须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就要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解决我们思想改造中的实际问题。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工作才能做好。这就叫重实践。

做到以上几条，可以说基本上具备当一名新时代合格党员的条件。

仅仅做到这几条还不够，做一名新时代合格党员，还必须做到坚定理想信念，加强个人修养，接受长期考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

我 13 岁参加革命，14 岁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5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要说当时 15 岁孩子就有共产主义信念，或者牢固树立什么的是不可能的。而是在实践当中，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有了一点革命意识，在实践中形成了信仰。在入党后感觉到思想政治水平很低，那就学习。由于当时只有小学 5 年级的文化水平，学历不高，就搜集资料，有机会得到了延安时期的整风文献，如上所说，有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内斗争》等等。读了这些文章，让我懂得了党员应该提高自己的修养，比方说，对己严，对人宽。后来到政府机关工作了几年，之后又到上海来读书，两年就大专毕业了。当时学校要求留下来当教员。在多方的协调下，后来调到了财政部上海干部学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那时候教学水平不高，又派我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学习，学习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帝国主义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反杜林论》等等，同时也读了很多毛主席的书，这解决了我理论方面的不足，从理论上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再经过后来的实践，一系列的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一直到今天，就形成了我牢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一生主要就做一件工作，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 第二，加强个人修养

在处理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社会、个人和他人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必须要提高认识水平。（1）个人与他人方面，千万不能搞个人至上，不能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要考虑他人，考量他人的利益、他人的诉求、他人的愿望。（2）个人与社会，千万不要信仰个人英雄主义、个人风头主义等，其实这是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一定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而不是骄傲自满看不起群众，一定要把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放在心中，素质就自然高了。（3）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要求把个人同国家和党的组织摆正关系。要立足本位，放眼全球，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志存高远。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事业，在全球范围内考虑，要解放全人类。共产主义是社会规律的发展方向和要求，这是最远大的目标。现在我们要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同各国人民一道，同心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处理好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也是党章第二章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解决好这三方面的关系，个人素质自然就提高了。

## 第三，接受长期考验

现在和过去历史背景下的时代不一样。过去有一点，就是在生死考验的情况下，而现在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我们的同学，都是在太平日子里过来的，没有经过生死的考验。过去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们现在没有二不怕死的问题。我虽然参加革命比较晚，但也有生死的

考验，毕竟是在 1949 年 9 月 30 日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国，好多地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宪、特等残匪到处都有，还没有镇压反革命，所以有生死问题。我们支部里有个同志，是上海一所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他是 1949 年 3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 1949 年 5 月才解放，这三个月里是有生死考验的。要是特务得到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名单，就要把他抓起来关到提篮桥，关到龙华，也可能在某个夜晚就把他枪毙了。他们班有个同学是上海解放后参加革命的，解放以后参加革命也有生死考验，他随刘邓大军去打重庆、打成都。走到路上，在湖南的山沟里被国民党残匪打死了。我们多少经历过生死考验，在这一点上比较现在的党员有所不同，这是战争时期和平时时期的区别。

现在没有生死考验，容易生“和平病”。要补上这一课，看来主要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考验。以我的人生经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同忠于领袖思想发展相统一。忠于党，忠于人民这个我们经常说，但忠于领袖思想发展是我提出来的。领袖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特别强调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它来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同时也要把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思想渊源搞清楚。我们的同学不论什么专业，都要与研究领袖思想发展结合起来，今后，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以党的指导思想为指导思想，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

#### **第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参加革命是一个 13 岁的小孩子，是一个司秤员，后来又去学了三个月会计，当了一年的会计就入党了，半年后就调到县政府当总会计了，那时候我才 16 岁，还差两个月。1950 年我 15 岁的时候入党，我认为入党以后要密切联系群众，你还是群众中的一员。要想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定要做到先人后己，对人宽，对己严，自己一定要做到在个人名利问题上不要去斤斤计较，也不要当一个人英雄主义去出风头。要埋头苦干，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纸上谈兵不行，要靠实际行动。1950 年入党到现在已经 68 年了，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2018 年 6 月 11 日

注：此文系杨宇同志和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座谈会讲稿

## 熏 陶（一）

韩祥林

我们的革命队伍真是一座熔炉，有志于革命的，经受熔炉锻炼和熏陶，幼稚的变成能者，铁变成了钢。其中老同志、老领导的言传身教起着传、帮、带的作用，使党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蔚然成风，就我的切身体会，略举数则，借此缅怀一些已故的老同志老领导对我的教育。

（一）1939年9月，我由交通员带领离沪到达“江抗”指挥部所在地苏州阳澄湖畔太平桥镇。组织上分配我担任中共江南东路特委的文印工作。“江抗”的全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是新四军三支队六团，由叶飞率领，于1939年5月，从江南茅山地区出发，向沪宁铁路东段地区敌后挺进，当越过沪宁铁路后即改用“江抗”的番号。

当时我只有17岁，刚从中华职业学校高中毕业，还是个“小青年”。我抱着满腔热情，一心要抗日、要革命，只要组织上分配什么，就做什么。当我接受任务分配后，就由傅学群同志领我去太平桥镇附近，与他住在一个村里。因傅学群是《江南》出版社的负责人，还带着从上海来从事出版工作的一批青年，他和这批青年住在村的北面，我是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住在村的南面，中间隔着一条河浜。

待我住定后，傅就对我说：“东路特委是江南东路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受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设在上海，因此来往信件，都要‘密令’即用米汤书写在不易被敌察觉的小说、旧报纸等的空白之处，收件人收到后，只要用碘酒一涂就能显出字形来。”因我在中学化学课学过

淀粉遇碘，就会变成赭色的原理，傅讲的密令技术，我很快就领会接受了。

傅又说：“在我们地下党，油印的党内文件，质量很高，成为传统。从事文印工作的同志，保密观念很强，凡是用过的废纸，都要彻底销毁，不留片纸只字，对待油印工具，非常爱护，刻写过蜡纸的钢板，要用煤油刷洗清爽，不留蜡纸的残腊，洗过以后再用布包好，不被磨损。用过的油印机，同样也用煤油将网罩和滚筒洗刷干净，不留残余油墨，在油印时，油墨必须调匀，沾在滚筒上，亦要均匀，推动滚筒时，用力定要均匀，这样才能油印出好的质量”。

傅的这些话，我是相信的，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不好好爱护工具，怎能有好的成品？有一次我确实看到地下党油印的文件，字体端正，印刷清晰，连字的一笔一划，其中一点点钢板的纹路也看得清，这样的油印件，堪称“精品”。

我是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敬业乐群”是母校的校训。而傅的讲话，实质是把“敬业”精神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使我完全接受。他的话还把做好文印工作，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结合在一起，把党的优良传统成为可以捉摸得到，并可以付诸行动的具体工作，更使我听得入耳。我就按傅的意见积极去做。

1939年底，从苏州城区撤下来的地下党员彭诚，组织上分配他与我一起工作。彭比我年长两岁，能力亦比我强，且有创见。他请木匠师傅做了一副夹板，将油印用纸，事先放在夹板里，用绳将夹板捆紧，

将纸压平，用平整的纸张油印，不会起皱。他还请铁匠铺打制了一把手工切纸刀将印好、装订好的文件小册子用刀将毛边切齐，如此油印件的质量更好，我们并没有辜负老同志、老领导的期望和教导。

傅学群同志，湖南人，在太平桥初见他时，年约 40 岁不到。他是位老党员，他在全民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从国民党的反省院里释放出来，我见到他时，自己入党不久，只有 2 个月。对老同志我怎么会不尊敬呢？解放后，傅在上海南京东路朵云轩书画社任经理，我曾去他家拜访过他，还曾去闸北公园，参加庆贺他 90 寿辰的聚会。傅现已作古。

（二）1939 年 10 月，江南东路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年的 5 月，“江抗”东进，一路上打击日寇，荡平匪患，深得人民拥护，却遭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他们从宜兴山里调了“忠义救国军”专事袭击“江抗”，与我摩擦。我军自卫战斗中互有伤亡。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防止事态扩大，“江抗”主力，主动撤出“苏（州）常（熟）”地区，西移扬中，再渡江北上，开辟苏中抗日游击根据地。

苏州阳澄湖地区，“江抗”东进前，原有一支地方武装司令胡肇汉，湖南人，原在青浦县当警察。1937 年淞沪战役上海沦陷后，他在阳澄湖地区收罗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当地帮会势力拉起队伍，自称司令。成为阳澄湖地区的“土霸王”。我党（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为了争取这支部队，曾派地下党员翁迪民同志，化名宫岳，到这支部队里担任政训处长，宫在胡部，曾促成该部与我党领导的常熟“民抗”部队合作抗日。“江抗”东进后，促使胡部接受“江抗”收

编。不久，“江抗”主力西撤，被收编的胡部，亦随之西撤。“土霸王”胡肇汉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江抗”拉走了他的队伍，失去了他升官发财的本钱。在西撤途中，他装病请假溜回阳澄湖畔，收容了同样“开小差”逃回的旧部和当地帮会分子，重拉队伍，勾结敌伪实行反共。

此时（1939.10）我们东路特委和一批地方民运工作同志，果断地从阳澄湖地区撤出，转移至常熟横泾镇和唐市一带（今沙家浜镇），这里原是我常熟“民抗”活动的地区。群众基础较好。1939年11月6日，根据党的指示，以并未西撤，留在后方医院，伤愈出院的36名伤病员为基础，重建“江抗东路司令部”，继续高举抗日大旗，打击日寇，保护人民，司令由夏光担任（即京剧《沙家浜》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原型）人们称新建的为“新江抗”。

东路特委移至横泾东唐市一带后，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各界抗日自卫会，在这基础上发展党组织，和建立村、乡、区、县的各级民主政权，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我们特委秘书部门转移至横泾东唐市后人事略有变动，秘书改由景毅同志担任，增加了交通员王加宝。景毅和王加宝两位都是从上海来的党员，与我一起做文印工作的彭诚，亦是此时调来的。连我一共四人，分散住在三个村庄，每隔半个月，聚集在我和彭诚住的村上来开党小组会，党小组成员还有一位宫岳同志，他时任苏州县委书记，党小组长由景毅担任。

党小组中最受我注目的是宫岳同志，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些，他原是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学工程的。就读时入了党，曾派他到阳澄湖胡

肇汉部工作，胡肇汉从“江抗”西撤途中逃回后，曾拷问宫岳同志说他“分化、拉走了他的队伍。”宫即晓以抗日大义，据理陈词，向胡指出，他并没有分化拆散胡的队伍。困难当头组织队伍是为了抗日，“江抗”西撤亦是为了抗日，决不应把抗日队伍作为个人升官发财的工具。胡肇汉自知理屈，又慑于“江抗”的威力，不敢对宫狠下毒手，放宫离开阳澄湖地区，宫脱离了虎口，回到横泾东唐市地区担任了苏州县委书记。

那年冬天多雪，宫岳同志穿着棉衣，踏雪赶来参加党小组会，从不缺席，发言也很积极，要知那时他的肺病正在发作，还常要吐血。他仍坚持工作，他那艰苦奋斗精神，为我们树立的榜样，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

1941年夏，东路特委改组，改名为“京（南京）沪路东特别委员会”（简称“路东特委”），由吴仲超同志担任书记，由陈耀华（即宫岳）任秘书长。管辖范围扩大，东至浦东、西至镇江到常州铁路。特委机关亦由“苏、常、太”移至“澄、锡、虞”。此时，陈耀华（宫岳）成为我们的直接领导，与他的友谊更深了。

同年7月，日寇开始对“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实施“清乡”。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原“江抗”）主力和公开的党、政干部转移出“清乡”区，我们遂与陈耀华（宫岳）同志分手。

1947年10月，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华东局情报部门工作，曾率领我科几位干部，从胶东北渡大连工作，得知陈耀华同志在大连疗养所疗养，我曾数次前去探望，1971年5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作为华

东纺织工学院的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后期我利用空余时间去北京白石桥陈耀华同志的寓所拜访。此时陈用名翁迪民，在一机部仪表总局任局长，见他身体瘦弱。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猛烈的冲击，给他戴的“帽子”，既多又很吓人，现在刚被“解放”等等。因为“文革”中我也受过冲击，对他所受委屈，我都同情和理解，临走时，他送我照片留念。

现他已经作古，但他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是成为我的榜样。

（三）1941年10月，十八旅主力跳出江南日寇“清乡”区，转移至长江以北靖江如皋一带。再奉命西进，开辟“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苏中军区等一军分区”（一分区）“六师十八旅”的番号保留，部队归一师师部（苏中军区）指挥。对江南敌人“清乡”区，我党改变斗争策略，改以群众性的合法斗争为主，辅以便衣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深入“清乡”区打击敌人，打开对敌斗争的新局面。路东特委改组后，把我调到十八旅参谋处工作。

十八旅的旅部和所属团队，需从靖江一带西进“江、高、宝”，必须穿越泰州向南至长江边的口岸镇，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过了这道封锁线即可进入江都县的南部地区。这条封锁线沿着泰州口岸南北向的河流穿过，修了一条公路，沿路敌人设置了许多据点，一般的据点，都只派伪军驻守，重要的如口岸镇等除伪军外，还有日军驻守。这是一条敌人从泰州通向长江出口的水、陆交通要道。亦是敌人将我苏中军区一、三两个分区分割开的封锁线，我军进入新区还要严守秘

密，不要过早惊动敌人，暴露我军开辟新区的战略意图。

为此，我们对通过这条封锁线的行动，作了周密部署，查清了这条封锁线的敌情和地形，准备在封锁线的中部地段，刁家铺据点附近通过封锁线，事先派出侦察员在该处河上架设浮桥，以便部队通过，为了防止敌人察觉我军意图，我们把部队集结在离这条封锁线较远的地点，然后作长距离的行军，突然通过封锁线，对部队也作了动员，号召大家不怕行军疲劳，争取胜利完成开进新区任务。一切部署停当，只等旅部下令。

1941年10月的一天傍晚，十八旅的千把人队伍出发了，由五十四团担任前卫。那晚天黑风大，长长的队伍从如（皋）西穿过靖江、泰兴宣家堡以南，一路行进，当快接近封锁线时，已是午夜过后，但见前方电灯闪烁亮成一片，不像预定的刁家铺附近的渡河点。一查才知，前方灯火是口岸镇，这是向导带错了路，才把队伍带到这里。

口岸是有日寇驻守的大据点，如需通过发生战斗就完不成开进新区任务，如退回绕道再去预设的刁家铺附近的渡河点，则时间已经不允许，天明前到不了江都南部地区宿营，在这左右为难之际，旅部和五十四团首长快速议定，将错就错，出敌不意，利用口岸据点和附近洋桥（公路桥）之间的一点间隙，和洋桥上只有几名伪警看守的弱点，果断决定：“部队就从洋桥上通过”。立即派出几名得力的侦察员，突然上去将伪警制服，关进路边的小屋内不许乱动。然后千把人的队伍，在明亮的路灯照耀下从宽阔平坦的桥面上，一个紧跟着一个疾驰而过，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不费一枪一弹，顺利通过了封锁线。想必据点

就在旁边的日本鬼子，此时正呼呼大睡，在做他们的黄粱美梦吧！

过了封锁线天明前安抵江都南部的吴家桥附近宿营，准备向北，再过扬州至泰州东西向的敌人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江、高、宝”的中部樊川以北地区，然后向南、北两翼展开，控制运河以东“江、高、宝”的全部区域，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次旅、团首长机智、果断的指挥，得到全旅上下的一致赞扬，树立一个值得学习的战例。

旅参谋长夏光，还对我们说“人们常说‘事非经过不知难’，但实践中，还会‘出现事非经过不知易’，这次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就是如此，事前我们从未想到过，通过封锁线这样容易”（大意）

夏参谋长这些话，富有哲理，是符合辩证法的。“难、易”都要在实践中体现，在一定条件下两者还会转化。因此，我们不要畏难而退，要勇于实践。

旅参谋长夏光，湖南人，1927年他在武昌毛主席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入党的老党员。他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严重的白色恐怖，曾两次被捕，保释后，与党失去了联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当他发现长沙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时，他立即主动弃职前去报到，由徐特立同志分配他去平江游击队，旋即编入新四军。在新四军中，他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1939年5月他随六团团长叶飞同志以“江抗”名义东进江南东路地区，同年10月，“江抗”主力西撤，他因病住后方医院治疗，留在阳澄湖地区，未随大部队西撤。同年11月，重建“江抗东路指挥部（新江抗）”时，他任司令。1941年“新江抗”改编为

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时，他任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参谋处长，参加了华东战场历次重大战役，如“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等，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功勋。新中国成立后，调他从事海军建设，担任过青岛海校校长等职。1955年，组织上审查他的历史，对他作了错误的结论，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无论是在地方企业，还是在高等院校，他依旧一心为党，积极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对他蒙受的冤案，作了平反并调他担任江苏省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离休。2012年1月去世，享年104岁，他时我们敬爱的一位老首长。（未完待续）

2019年3月

谨以此文纪念邵伯周先生

## 邵伯周：撑诗天地与人看（节选二）

“我边教学边研究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的作品，还去越南给河内师范大学的师生讲过中国现代文学课，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文学也是如此。1954年，邵伯周进入上海师专执教《现代文选及习作》，从此他一生便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联系在了一起。刚进去时，教现代文学的只有他一位老师，老教材是民国时代的已不好用，所以要靠自己写新教材和讲义。当年这一学科的教学，必须坚持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以周扬的《新的人民文艺》《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战线上在一场大辩论》等文章作为组织教材的纲领和叙事、论人、评文的准绳，这也是当时的主流思潮。因此，他参与了当时教育部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后来又不断根据当时的政策修改和编写新的教材，正是在他编写教材和讲课育人的过程中，上海师院的现代文学学科建立起来了。

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后，必须有研究成果，邵伯周将目光投射到文学巨匠鲁迅和茅盾身上。经过多年的研究，从1956年第一部《鲁迅研究概述》书稿送出版社付印时，他又开始对茅盾的研究。校领导得知后出于好心提醒，劝他不要研究现在还活着的人，而研究像鲁迅这样“盖棺定论”的人比较稳妥；因为活人是会变化的，如果以后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研究者也会跟着倒霉。现实的例子是，有位教师

上课时曾向学生介绍过胡风的著作，结果在“反胡风”的运动中，这位教师因受到学生的揭发而被政治审查，差点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好在当时正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邵伯周没有接受校领导这一善意的忠告，因为要搞研究总要担点风险的。尽管此后还经历过那场狠打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幸运的是并没有人强制他停下来。因此到1959年，他的《茅盾的文学道路》一书又出版了，而且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在1959年到1960年，邵伯周还作为中国专家组组长，应邀前往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不仅在1960年5月12日受到了访越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还荣获越南政府授予的“友谊奖”。

**“在‘文革’中我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关过‘牛棚’”**

1961年后，虽然邵伯周在高校教学工作还是循着主流思潮进行，但师生都要频繁下乡，参加“双抢”、“三秋”、“四清”等活动；在文化学术领域，惊心动魄的大批判更是一波接一波，既没有时间，也搞得他没有心情搞研究、写文章了。

特别是在“文革”中，邵伯周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扣上“推行‘文艺黑线’，为‘反动权威’树碑立传”等罪名，不仅文学研究工作被停止了，而且还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靠边站”，住在“牛棚”里。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日记本、讲义、信件、有毛主席头像的金质纪念章，还有《瞿秋白文集》《赵树理小说》和丁玲、周扬的作品集，甚至连银行存折里的200元钱加利息，也被逼取出来全抄走了。他被责令写检查，但他没有交代出什么，红卫兵就从上海找到他

家乡，看到他家只有两间破屋，而且贫下中农都说他是个好人。红卫兵最后找到他白石乡教书时的同事廖老师，要其揭发他的罪行。结果廖老师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挨了他们的一顿毒打。他被红卫兵打成“臭老九”，能参加跳“忠字舞”就是莫大的光荣了，所以他几乎是在迷惘、焦虑、无奈、不安和期待中过日子。直到1969年夏天，他参加了工宣队领导组织的“吐故纳新”整党培训班后，才恢复了党组织的生活。

1969年10月，邵伯周随学校中文系的学生到一个叫陈坊桥的地方，接受了贫下中农近8个月的再教育。全体师生返回学校不久，他又作为第二批成员到江苏省大丰县海边滩涂一所“五·七”干校劳动，主要从事割芦苇、开河沟等农活，条件非常艰苦。到“文革”后期，我国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各地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底，从江苏大丰“五·七干校”回上海的邵伯周终于走上讲台，为学生教毛主席诗词。1975年间，他有幸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鲁迅著作注释组的工作，为《鲁迅全集》进行新的注释，他承担了《鲁迅全集》中《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年后部分书信的注释工作。这期间，他终于才有点时间来研讨鲁迅的著作，并积累了一些资料。

### **“改革开放迎来了艺术的春天，文学研究开始出成果”**

腊后花期知渐近，寒梅已作东风信。粉碎“四人帮”后，宣告我国“十年文革动乱”结束，邵伯周先生重新回到现代文学的教学岗位上。1978年当长江文艺出版社要求重印他1959出版的《茅盾的文学

道路》时，让他感叹道：“二十年前的书还要重版，可见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是多么的空白。”他决心把失去的那段时间追补回来，于是他便及时对原著进行认真的修改、补充。1979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的《茅盾的文学道路》与读者见面，评论家吴福辉认为邵伯周的这本书与其他几部研究对象相同的书，是“茅盾研究新起点”的标志。

因研究茅盾文艺思想，1979年春，邵伯周还致信茅盾先生，就相关问题向茅公请教。茅盾于同年5月3日就抱病给他复了信：“伯周同志，来信敬悉。我最早的文学论文，从发表的时间来看，是登在《东方杂志》第十七卷一号上的《现在文学家的再责任是什么？》，署名佩韦。但《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因为登在“小说新潮栏”，所以容易引人注目。至于《社会主义下的科学与艺术》不是论文而是一篇译文。照片随函附上，这是文革前的照片。近来很少拍照，身体不好，又有慢性气管炎、冠心病以及其他一切老年病。走路困难，站立不稳，双肢发抖，卧床时多……”这封珍贵的书信，后收入《茅盾全集》第38卷。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随着拨乱反正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化，人们的头脑开始从教条主义和“迷信”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理论思想领域和文化艺术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曾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重新被定为香花；被诬陷和被打入另册的作家恢复了名誉；“黑线专政”论被推翻，肯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贯穿了一根红线；各种流派的外国文艺被译介了进来；文学

理论不再一家独尊，而是众说纷纭了。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的思维定势动摇了，眼前豁然开朗。同时头脑中却又冒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在“本本”中又找不到答案。

随着我国发生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让邵伯周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此时起，创立学校现代文学研究硕士点的他，当时的教学任务是带教研究生，他先后开设了“马列文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鲁迅研究”“茅盾研究”等学位课程。带教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教学的要求更高了，任务逼得他非多找资料、多读书、多思考、多动笔不可。可当时因资料稀缺，他就去徐家汇藏书楼、上海辞书出版社翻阅《新潮》《新青年》《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甲寅》《礼拜六》《申报·自由谈》《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洪水》《语丝》《人间世》《宇宙风》等民国时期的旧报刊，查找、抄写相关资料。

邵伯周在收录茅盾作品散佚的部分非常难找，后来他听说上海辞书出版社因为前身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有民国时期的旧报刊，便和他在上海师大附小当老师的夫人天天跑到那里，翻阅旧报刊查找茅盾的作品，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手抄。这样就使科研和教学得到较好的结合：或讲课后把讲稿整理、充实为论文发表、专著出版，或先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用来作为教材。同时开始对自己的文艺观和对现代文学这一门学科进行反思，并把反思所得的一些新的看法融入教学和科研中。

1981年9月，邵伯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当选了鲁迅研究会的理事。同月，他参与筹建中国茅盾研究会的工作，商讨出版《茅盾全集》的事宜，他担任了《茅盾全集》编委会委员，并具体负责《茅盾全集》第五卷《腐蚀》的编校和审定工作。《腐蚀》以1940年9月到1941年2月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女特务赵惠明的一段经历。作品以日记体的形式，透过赵惠明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记述，把“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侧面表现出来，作品既描写了作为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的复杂生活和心理状态，刻画了典型形象，也集中抨击了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制度的罪恶。《腐蚀》开始写作于1941年夏天，最早是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香港出版）上连续发表的，这是茅盾先生一部重要的著作。邵伯周在编校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了邵伯周的不懈努力，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93年大约15年间，他出版了关于鲁迅研究的专著、论文集3部，其中《〈呐喊〉〈彷徨〉艺术特色探索》一书198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哲社研究优秀著作奖；茅盾研究的专著1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3部，其中《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一书，1993年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出版。《人道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是198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形成这本专著，同样在1993年获得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出版。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发表论文评论80多篇，其中《论鲁迅的中外文化观》，获得了上海市哲社研究优秀论文奖。据此，1982年

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先后当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常务理事及名誉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1986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茅盾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他当选为副会长；1998年10月，被第四届中国茅盾研究会聘为顾问。1987年上海市文联还授予他“培养文艺人才杰出贡献奖”。

1993年9月，邵伯周先生送走了他教的最后一届研究生，便光荣离休。但他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发挥余热，尽管他身患高血压、脑梗、痛风、腰椎病、失眠等疾病，在十年间仍写就了长长短短20来篇有分量的作品，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报》《鲁迅研究月刊》《茅盾研究》《文学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不仅受到冯光廉等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好评，还获得（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韩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央图书馆长、文学博士韩武熙两次致信表示钦佩和赞赏。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介绍邵伯周先生的《茅盾几部重要作品的评价问题》一文，此文针对新时期一些专家学者研究茅盾作品中的不同看法，根据自己长期研究茅盾作品的丰富经验和成果积累，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甚至对一些有些偏颇的评论文章直言反驳，给茅盾作品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篇文章原是他交给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茅盾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当《文学报》的编辑朱小如等人上门约稿时，他便将论文底稿交给他们。因篇幅较长，他们选用了论文的第二部分。没想到当大样排出后，在《文学报》编辑部就有人提出要将此稿撤下。后来报社总编刘金在审阅大样时，对此文非常赞赏，他还写了一段批

语：“这是近几年来在《文学报》上读到最好的一篇理论文章。”1996年4月7日，文章在《文学报》发表后，同年7月26日在《文艺报》全文转载，引起极大反响，好评如潮。因此，当年就获得上海纪念茅盾诞辰100周年论文一等奖；1998年，更是摘取了国家级奖项——（首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并收入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理论评论卷）；2001年7月，在桐乡召开的纪念茅盾逝世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又荣获“茅盾研究突出成就奖”。

此外，邵伯周先生还出版了1本论文集和1本杂集，真可谓老有所为。他的学术成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被聘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顾问，其名字和简要事迹分别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写的《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编写的《世界5000名人录》。

邵老心中一直惦记着家乡，前几年还为家乡文化礼堂建设写信提供历史资料，他的话语中满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邵老：您是中国文坛的英杰，更是江山的骄傲！

2018年10月

——摘自《今日江山》

## 节日漫谈（四）

### ——端午节

吴世常

夏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名端五、端阳、蒲节、艾节、女儿节、诗人节、天医节、卫生节、龙舟节、粽子节、天中节。端午节起源于中国，后来传到了东亚的韩国、日本和越南。据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记载，端午源于春秋时期。以后各地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对端午节的来源作出各自的诠释。有纪念越王勾践为操练水兵而划龙舟说，纪念伍子胥沉江自尽说，纪念曹娥投江救父说。比较流行的且为多数人认同的是投汨罗江自沉的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初辅楚怀王，任左徒、三闾大夫。后遭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谗害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都郢也被秦兵攻破，他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在湖南省东北部）而死。有《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伟大诗篇传世。

端午节的习俗活动很多，一是划龙舟。当时荆楚之人，舍不得屈原投江死去，于是划船追赶拯救，是为后来龙舟竞渡之起源。也有人说划龙舟的目的是祈求农业丰收和驱除瘟疫的。前者如《浙江通志》引《西吴里语》“居民各棹彩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田蚕”。后者如《长

沙府志》卷十四：端午“坊市造龙舟，竞渡夺标，俗以为禳疫”。二是吃粽子。荆楚之人，在五月五日煮糯米饭或蒸粽糕投入江中，以祭祀屈原，唯恐被鱼吃掉，故用竹筒盛装糯米饭掷下，以后渐用粽叶包米代替竹筒。南朝梁吴均《齐谐记·五花丝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又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每届端阳以前，府第朱门，皆以粽子相馈赠，并附以樱桃、桑葚”等物。三是插菖蒲和艾虎，佩香囊、喝雄黄酒。古代民间认为五月为毒月，初五又是毒日。为了克毒避邪，要插挂驱邪香草，佩戴护身灵物。“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详，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燕京岁时记·草蒲·艾子》）。又《清嘉录》卷五云：市人佩香包等饰物以驱邪，饮雄黄酒以健身，“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又以余酒染小儿额手足心，随洒墙壁间，以祛毒虫”。雄黄酒（注），是酒内加入了雄黄，其中含三硫化二砷，服微量可治病，多饮之则有害，《白蛇传》中白素贞就因多饮了雄黄酒而现出了原形。四是悬挂钟馗画像。传说钟馗既可打鬼，又可驱疫。清顾禄《清嘉录》卷五：端午节“堂中挂钟馗画图一月，以祛邪魅”。关于“钟馗辟鬼”故事，宋沈括《补笔谈》和明陈耀文《天中记》中都有论述：唐明皇开元年间，自骊山讲武回宫，疟疾大发，梦见有大小二鬼。小鬼穿大红无裆裤偷杨贵妃的香囊和唐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大鬼穿蓝袍戴帽子，捉住小鬼，挖其眼一口吞下；明皇喝问，大

鬼奏曰：臣乃终南山进士钟馗，被黜落第，忿而触阶而死，并言他日愿为天下降妖除魔。明皇醒后，疟疾痊愈，而且身体更为强健，于是令画工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之图：“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原话已失传，这里是北宋鉴赏家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中所描述的）。唐明皇看了吴道子的钟馗画像后颇为高兴，奖润笔（报酬）百金，并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鬼神。此外，中国民间传说中驱妖通邪之神还有两说。一说是由“终葵”（即椎）演化而来。古代民俗以椎逐鬼，六朝之人认为“终葵”可驱鬼辟邪，后演化为“钟馗”。另一说是由商代仲傀演化而来，仲傀为巫相，兼驱鬼之方相，后由驱鬼之巫成为食鬼之神（《辞海》1999年版）。

端午是我国的传统佳节，自然激发历史诗人的讴歌。如唐代张建封的《竞渡歌》：“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又如宋朝苏轼的

《云么令》上阙：“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都是脍炙人口的端午诗。反复吟咏之，如与诗人共座，齐赏竞渡龙舟，同吃糯米香粽。

2008年6月，端午节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

（注）：雄黄的主要化学成分是有毒的二硫化砷，加热后会变成三氧化二砷（砒霜），如果误服，5-50mg即可引起急性砷中毒，严重者甚至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麻痹、意识模糊、昏迷等。雄黄酒洒了床底、墙角等阴暗位置确实有驱虫效果，但是人饮用尤其是多饮了则有害。（见2017年6月9日《报刊文摘》4版）

## 武汉人的性格

赵兴华

城市面貌有可能千城一面，但是不同城市人的性格却各具特色。以前工作时出差，遇到几件事，让我领略到武汉人的性格。

**火气大：**1956年，我出差去武汉，当时正在建武汉长江大桥。走在路上，坐在车上，到处都可见身着统一的有“大桥”标志服装的建桥工人。作为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建设者，工人们有一些自豪感，有一次我乘公交车，车上人很多，也有不少建桥工人，人多嘛，我只好用力挤上去，这时却有一个建桥工人冲我喊：“挤什么？”说话嗓门特别大，让我体会了武汉人火热的性格，我想这是和武汉天气炎热有关吧。

**韧劲足：**出差到武汉，到饭店用餐，我按上海的习惯，坐在位子上，等服务员来招呼，吃什么？可是在武汉我坐在位子上很长时间也没人来问你，我走到服务员面前对他讲：“我要碗面。”过了一会儿，服务员送来一碗馄饨，我说“我要的面呀”，服务员不但没有表示歉意，一个劲地说“吃什么吃不饱呀！”就是不给我换面条，着实让人感到武汉人没有弯弯精，说话特别容易得罪人。

**爱骂人：**有一天，我经过一家百货店，店面不大，当时只有一位女店员，有一男顾客在买东西，不知为什么，两人发生争吵，结果女店员从柜台下面抽出一把一公尺多长的刀，向柜子上拍，对着顾客大吼！男顾客见状，只得急忙走开。

几件事情，让我体会武汉人火爆的性格，让我对武汉留下了不太好印象。其实，在几十年对武汉的关注中，我慢慢对武汉人的印象转变了，其实武汉人火气大或者是爱骂人也好，武汉人性格就是这样，没有恶意，是率真和直爽，还带着韧劲和精明能干。

武汉有着三千多年历史，历史造就武汉，武汉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祥地，历史上的武昌起义也发生在武汉。今日的武汉已经成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正是武汉人性格中的韧性、坚韧不拔和精明能干才使得武汉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武汉东湖边见到一副对联，“今日西湖要比东湖好，将来东湖更比西湖强”，这幅对联不也是真实映照了武汉人的性格吗？

2019年3月